

新马克思主义 导引

Neo-Marxism

K H A S a e n - Y a n g

(法)高宣扬 / 著

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寻求的是一种
新型的 社会 哲学
这种社会哲学的目的是——

对人的命运作哲学的解释

但这里所指的是人，不是单纯的个人而是

作为共同体的成员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新马克思主义 导引

Neo-Marxism

K H A

Y a n g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内容提要

新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理解,其不同于我们日常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是指自 20 世纪初以来,尝试重新检讨或反思马克思古典理念,使马克思主义并不只限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形态,而是成为全体进步人类实现社会正义化、合理化和自由化的指导理论,这股思潮已经渗透到社会和文化生活之中。本书主要以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为发展脉络,介绍了自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先驱——卢森堡、卢卡奇、科尔施等思想家以来的基本内容及其实际影响,并针对该学派的代表人物: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人的生平简历、思想学说作一全面性的论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马克思主义导引 / (法) 高宣扬著.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7
(高宣扬文集)
ISBN 978 - 7 - 313 - 15965 - 6

I. ①新… II. ①高… III. ①新马克思主义 IV. ①D0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48112 号

新马克思主义导引

著 者: [法] 高宣扬

出版发行: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番禺路 951 号

邮政编码: 200030

电 话: 021 - 64071208

出 版 人: 郑益慧

印 制: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880 mm × 1230 mm 1/32

印 张: 10.25

字 数: 256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313 - 15965 - 6/D

定 价: 7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 0512 - 68180638

高宣扬文集总序

当我个人生命创建第七十环年轮的时候，我幸运地成为上海交通大学教师队伍的一员，使我的学术生命有获得新生的可能，我的生命也由此获得新的可能性，上演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生命乐曲。所以，我在交大“学者笔谈”上发表题名为“新鲜的交大人”的感言：“历史总是把我们带领到远离故乡的世界尽头，但有时又突然地把我们带回故居和出发点。历史使我们学会了感恩”。其实，生命永远是在自我给予和接受给予的交互往来中延伸，所以，感恩始终伴随着生命自身，构成了生命交响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生命的价值及尊严奠定本体论和伦理基础。

生命是一部无人指挥的交响乐，自创自演，并在不同的社会遭遇和生活历程中一再地自我协调，演奏出一曲又一曲美丽动听的自然乐曲，弹奏出每个人在社会、文化、历史的不同命运，演播成充满悲喜交织的无数千变万化的生命故事。

我的书实际上就是我个人生命历程的自我展现。每一本书从不同角度讲述着不同阶段的生命故事。生命的故事千差万别，归根结底，无非就是生命对自身生长发展的自我关注，都是由生命内在创造力量与周在世界各种因素相遭遇而交错形成的。生命在自我关注的过程中，

总是以顽强的意志和万种风情,一方面激励自身在可能性与不可能性之间的悖论困境中脱颖而出进行创造更新,另一方面严肃正视环绕生命的外在客观力量,自然地要对自身的命运进行各种发问,提出质疑,力图寻求生存的最理想的优化状态,从而有可能逐步演变成哲学性的探索,转化为生命的无止尽的形而上学的“惊奇”,对生命自身、对世界万物、对历史以及自身的未来前景,进行本体论、认识论、伦理学和美学的反思。

从学习哲学的第一天起,我就牢记古希腊圣贤亚里士多德关于“哲学就是一种好奇”的教诲。从1957年以来近60年的精神陶冶的结果,却使我意识到:“好奇”不只是哲学的出发点,而且也是一切生命的生存原初动力。因此,对我来说,生命的哲学和哲学的生命,就是血肉相融地构成的生命流程本身。

生命的反思虽然表达了生命成长的曲折复杂历程,隐含着生命自身既丰富、又细腻的切身感受,但绝不会封闭在个人狭小的世界中,也不应只限于文本结构之中,而是应该置于人类文化创造的生命运动中,特别是把它当成人的生命本身的一个内在构成部分,从生命的内与外、前与后,既从环绕生存的各种外在环境条件的广阔视角,又从生命自身内在深处的微观复杂的精神状态出发,从哲学、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符号学、心理学和美学的角度,试图记录一个“流浪的哲学家”在四分之三世纪内接受思想文化洗礼的历程,同时也展现对我教诲不倦的国内外师长们的衷心感恩之情。

最后,我还要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表示感谢,特别感谢刘佩英女士和刘旭先生,他们对本文集的出版给予了最大的支持。

高宣扬

2016年4月8日

马克思思想的生命力及其理论效应： 2016 年新版序

根据最权威的“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 即 A&HCI)对全球 1,100 种最有影响的学术杂志以及 6,000 多种出版物中抽取的引文数据,在 1993—2000 年间,被引用最多的十名作者中,首推马克思,而在马克思之后的重要作者和著作,按顺序分别是列宁、莎士比亚、亚里士多德、《圣经》、柏拉图、弗洛伊德、乔姆斯基、黑格尔和西塞罗。由此可见,不管时代如何动荡,也不管世界上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马克思始终是人们重点关注的核心人物;在全球化时代,重读马克思著作,特别是他的《资本论》,俨然成风^①。

像马克思这样的人物,逝世后一百多年,依然成为世界多数人心目中的关注对象,在近现代历史上是罕见的。他的思想的深刻性及其对整个社会生活的重大影响,导致人们对他的思想及其命运的不同寻常的关注,同时引起无止境的不同争论,这一切,不是任何个人或群体靠其主观意志或人为的力量可以控制或操纵出来的。正因为这样,对马克思思想的研究,才值得成为世界范围内学术界持续进行的重大论题。

在中国现代史的整个进程中,马克思一直是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

他的思想的存在及其辐射出来的精神威力,已经成为任何人都难以阻挡或回避的无形力量。拥护他和反对他的人们,从19世纪下半叶以来,逾百年左右漫长曲折的历程,以反复激烈的论争,甚至通过不惜付出无数生命的残酷战争的代价,对马克思思想的内在价值及其实际功能,进行探索、考验及检证。

我们这一代人,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恰恰成为马克思思想发展及其命运的见证人。这也许正是我们所处的时代本身,不但恰好与马克思思想相遭遇,而且社会的历史命运本身,也同样地与马克思思想的发展运势,始终紧密相联,沉浮颠簸,奔流向前,而我们自身也不得不随时都要面临选择立场和态度的严肃问题。

拙著《新马克思主义导引》的撰写出版及其在海峡两岸三地的多次再版历程,从1979年至今,不但与我个人学思历程的进展相交织,而且也生动地反映了近30多年中国及全球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的动态本身的各个侧面及其内在复杂因素。

最初,本书只是我个人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在巴黎第一大学哲学系准备的博士学位论文的一个延伸产物。我在1983年交给博士学位答辩审查委员会的论文,由当时巴黎第一大学哲学系主任、我的导师爱莲娜·魏德林教授(Hélène Védrine, 1926—)建议,题名为《论霍克海默的唯物主义》。这篇论文表面看来是我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在巴黎大学和法兰克福大学反复来回分析调查研究而撰写出来的。但实际上,在论文的选题及其完成的背景,正是当时中国社会及全球政治、经济和文化形势发生激烈动荡的关键年代。

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的转折,在法国思想界和学术界也展现出鲜明的意识形态争论的特征。基于当时法国及整个欧洲环绕马克思思想的激烈争论,又考虑到我个人的学术背景,爱莲娜·魏德林教授

建议我选择这个论文题目。魏德林教授本人亲身经历了多次思想争论，她同让-杜尚·德桑迪(Jean-Toussaint Desanti, 1914—2002)和弗朗索瓦·沙德列(François Châtelet 1925—1985)等人一起，始终关切当代法国思想的发展历程。在向我建议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同时，她也邀请她的同事、巴黎第一大学哲学系美学家兼法兰克福学派研究专家奥利维耶·勒沃·达伦(Olivier Revault d'Allonnes, 1923—2009)跟她一起指导我的论文。

1968年，法国学生运动从高潮进入低潮，马克思思想也逐渐受到各种思潮的质疑、反思、批判和重新评价。这一历史转折，一方面将陈旧的思想体系，更彻底地送进历史的博物馆；另一方面，又引起更复杂的思想冲突，加深和激化了原有的理论争执，使原有的思想营垒发生新的分化。原有的激进派队伍中，有一部分思想家，面对社会现实状况与他们所怀抱的理念之间的差距，宁愿从新选择自己的意识形态立场、观点和方法。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在哲学领域中，以结构主义为基本思想动力，各种以批判传统思想为特征的新思想，以百花齐放的方式展示出来，并在它们之间相互竞争，同时也把它们对传统思想的批判，进行得更加彻底；而从原有激进派中分离出来的青年思想家，以格鲁克曼(André Gluckman, 1937—2015)、贝尔纳德-亨利·列维(Bernard-Henri Lévy, 1948—)、让-马里·贝努阿(Jean-Marie Benoist, 1942—1990)、让-保罗·多列(Jean-Paul Dollé, 1939—2011)、米歇尔·格林(Michel Guérin, 1946—)、克里斯蒂安·钟贝(Christian Jambet, 1949—)、吉·拉德鲁(Guy Lardreau, 1947—2008)、弗朗索瓦·列维(Françoise Lévy)及菲利普·内莫(Philippe Némó, 1949—)为代表，给自己贴上“新哲学家”(les nouveaux philosophes)的标签，对他们自己以往的哲学观点，进行忏悔式的理论清理，试图创立新的时髦思潮“新

哲学”^②。

显然,在我们面前展现的,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连续不断进行的自由学术争论所带来的理论建设和文化重构的活跃繁荣局面。精神分析学、存在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符号论、诠释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建构主义、新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各种理论派别、意识形态和科学理论,先后登场,各抒己见,一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自由创造局面。

1980年,萨特和罗兰·巴特先后去世,给我很大的心灵震荡,激励着我以更加狂热的情感,潜心阅读他们的著作,并认真思考他们所提出的问题。他们的先后逝世,使我感受到时间的紧迫性、生命的短促和脆弱性,也使我更加珍惜生活的一分一秒,以更大的效率投入研究。从1979年到1983年,当我在巴黎一大准备和撰写博士论文《论霍克海默的唯物论》时,在北大时期所形成的原有的马克思思想观点,开始同在法国时期所感染的各种新思想相互交错和进行对话,构成了我本人思想转变中最紧张和最有意义的新阶段。

当时,我获得宝贵的机会,先后在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巴黎高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des Sciences Humaines et des Sciences Sociales)、巴黎大学和巴黎高等师范学院(École Nationale Normale Supérieure de Paris)等著名高等学府,直接聆听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德勒兹(Gilles Deleuze, 1925—1995)、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 1908—2009)、保罗·利科(Paul Ricoeur, 1913—2005)、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 1905—1995)、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1930—2004)、维尔南(Jean-Pierre Vernant, 1914—2007)、杜美济(Georges Dumézil, 1898—1986)及米歇尔·塞尔(Michel Serres, 1930—)等人的讲演、课程和研讨会,

并利用各种机会与当代法国各重要思想家会面，同他们直接对话，讨论共同感兴趣的理论问题。

1983年到1988年，我获巴黎第十大学副校长拉毕卡(Georges Labica, 1930—2009)教授同意，参与他所领导的科学研究小组，并成为他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政治、经济、社会哲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担任国际学术杂志《当代马克思》(*Actuel Marx*)国际学术委员会委员，并在它的创刊号发表论文《剧烈变动中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③。同时，我也很幸运，能在我的指导教授魏德林和达伦的推荐下，在著名哲学家德里达、法国哲学会主席雅克·董特(Jacques D'Hondt, 1920—2012)和拉毕卡的帮助下，在当时由密特朗总统直接推动下成立的巴黎国际哲学研究院(Collège International de Philosophie)中，连续两年主持关于现代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比较研究的研讨会。所有这一切，为我提供了珍贵的学习机会，也为我开辟了广阔的新视野，有助于提高我对马克思思想的反思能力。

应该说，20世纪70年代，法国思想界已经完成了从单纯接受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Hegel, Husserl, Heidegger, 法国人简称为“3H”)和“三位怀疑大师”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Marx, Nietzsche, Freud, 法语 trois Maîtres de soupçon, 简称为3M)思想影响的时代，转向具有独创性的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新时代；也就是完成了从对于黑格尔辩证法、胡塞尔现象学和海德格尔存在论的推崇，从对于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怀疑精神的追求，转向以自身思想创造为基础的自成思想体系的成熟阶段。

从这个时候起，一直到21世纪交接时刻，历经三十多年的争论和创造，在法国思想激烈变动的洪流中，不只是可以看到法国社会生活图景以及各种物质的、有形的社会宏观架构的变革结果，而且，连同那些

隐藏在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禀性、喜好和品味以及在无声无息中影响到行为举止的各种心态和思想风格的变革,也表露无遗。越是深入细腻地探索其中的奥秘,就越感受到支持着这一切变化的深刻理论基础所隐藏的强大思想力量。法国人那种浪漫自在的生活情调背后,往往包含着深刻的自由反思活动,以至于当人们无意中触犯他们的普通日常生活方式时,他们就会情不自禁严肃地捍卫其个人选择的自由,使他们原本闲逸多姿的情趣,刹时间变成情绪高昂的基本人权辩护士。甚至在巴黎乱哄哄的地下铁车厢中,都可以随时看到处于混乱却又高度自律的读书人,任嘈杂的车轮声和说话声于不顾,而坦然自若地翻书阅报。只有细细考察他们的生活和思想感情,消化他们的历史传统中的思想,才能逐渐发现法国逾 60 年来一切变化的思想根源。

研究新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对我来说,远不止是一种学术研究活动,并且也不知不觉地成为个人思想逐渐转变的过程。法兰西学院的维尔南教授在谈到古希腊时期有关个人、死亡、自身与他人的问题时指出,个人的人格、身份的自我认识和社会确认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它同人对于不朽的无止境探寻的思维活动是联系在一起的。他认为,只有人,才存在人格和身份的问题,也只有人才把这些问题同认识自身、认识生活、认识历史、认识社会和认识世界的活动联系在一起,同自己的生存及死亡、同自己的社会历史命运联系在一起。他的深刻思想同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 1906—1975)以及米尔西亚·埃利亚德(Mircea Éliade, 1907—1986)的思想观点结合在一起,给了我重重一击,粉碎了我原有的世界观框架,使我猛然地重新发现人的原本面貌,也对自己的生命重新进行了反思。

我深深感到:人只有在同社会和文化的反复对话中,才能最终认识自己,才能真正认识世界。从根本上说,人在一生中,不管是谁,只要

他确实期望生命变得有意义，就要不断超越现实，并又不断回归现实世界；在虚无与有形的世界之间循环游走。人的生活世界和文化实践，就成为反复超越的中介。正是在这里，我才真正理解生命和死亡的另一意义；而且，也领悟到唯有通过死亡才能表现生命。人只有在理解到生命与死亡的同样意义之后，才对于自己的生活命运有所了解，才能够使自己的生活从有形的世界中扩展到无形的世界，并将两者连接在一起，在两者之间进行反复的穿越和往返，不断反思生命的意义。我不是教徒。在北大读书和多年的研究，使我不想加入任何宗教组织。但到了法国以后，通过对于人的本质的探讨和各种论战的参与，更深入地理解了宗教同人的本质的必然联系；这种必然联系，就如同人的本质同哲学、科学认识以及同艺术的必然联系一样，是哲学家和所有人理解人的本质以及自身的命运的基础。宗教经常被人误解为迷信权威，崇拜偶像的愚人宝物。但真正的宗教却引导人不只是关心个人的生死祸福，更注重教导人要关怀他人，像佛家那样，“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像耶稣（Jésus）那样，为全人类的命运，宁愿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使人类获得救赎和永生，牺牲个人生命在所不惜。我在法国看到各种类型的天主教徒，他们多数有思想，又有高尚的情操，对于人的生与死、个人与世界、有形与无形，都有深刻的反思。

就我个人而言，当我来到巴黎第一大学注册博士生的时候，我已经不是刚刚从大学本科毕业的青年学子，而是踏入“不惑之年”门槛的“壮年”研究人员；经历了十年“文化大革命”，又积累了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十多年的实际研究经验，从面临全面改革开放的中国大陆，途经被称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站”的香港，再到达法国之时，“后现代”也正悄然登上西方思想文化舞台。

1979年，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

1924—1998)发表其名著《后现代的条件》^④,在该书中“后现代”的哲学概念刚刚被利奥塔锻造“出炉”;而由后现代建筑学家罗杰斯(Richard Rogers, 1933—)和皮亚诺(Renzo Piano, 1937—)设计,并象征着“后现代”高科技精神的“蓬皮杜国家艺术文化中心”(Centre national d'art et de culture Georges Pompidou),也已经屹立于巴黎市政府大厦附近的“布堡平台地”(le plateau Beaubourg)近四十年。整个西方人文和社会科学界,经历了从战后到20世纪60年代多次争论和危机的震荡,各种思潮相互渗透和不断分化,构成了一幅由危机和希望、批判和创造所交错的激荡人心的历史文化景象。经历300多年发展而极端成熟化的“现代主义”,正当其内含理论能量和创造精神得到充分发挥的同时,其中的各种内在矛盾及其悖论性也充分地暴露出来了。“后现代主义”就是如此地在现代主义不知不觉的发展和危机中,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和文化内部逐渐地生长出来的。

这是“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相互交接、“现代性”通过“后现代性”进行深刻反省、“后现代性”正不断吞噬和超越现代性的时代。这一切,标志着西方社会文化舞台正在掀开新时代的历史帷幕。

正是在思想创造及其相互争论的过程中,马克思思想不但从不缺席,而且还主动经受考验,坦然面对各种挑战,以身比试,使马克思主义本身,不但没有被淘汰,反而在争论中重估重建重构,马克思思想本身以其内在思想生命力继续维持在思想学术界的突出地位。

当然,同时也要看到,马克思思想所遭遇的危机,不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范围内,都不是可以简单分析论述明白的。由于马克思学说具有独特的历史、意识形态性质和实践意义,使它对于当代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影响表现出非常复杂的和矛盾的特征;人们往往把它同世界上各种标榜“马克思主义”的党派和实际活动简单地等同起来,因而未能充

分估计和正确评价马克思学说的理论意义。美国纽约社会研究新校教授海尔布隆纳(R. L. Heilbroner, 1919—2005)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现代世界中一个令人时刻感到惊悸的存在，是激起人们最热切的希望和恐惧、并使人产生种种大相径庭的见解的根源。”^⑤

从1978年到80年代初，中国正在迈开走向全面现代化进程的步伐。也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在中国市场经济旋风的冲击下，中国竟有相当多的人，未经冷静思考，“赶时髦”，就把马克思著作成批地销售到旧书店，试图把马克思“打入冷宫”。刚刚出国留学、又急于更深入研究马克思思想的我，也就在那个时候，轻而易举地低价购买了完整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在世界范围内，柏林墙的倒塌以及原苏联和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的瓦解，促使西方国家中的右翼知识分子乘机对马克思倡导的国际共产主义事业进行攻击，他们不仅发动了对马克思及其原来的追随者的政治攻击，而且还在理论上提出了一系列新论述，试图一方面论证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理论的正当性，同时另一方面也全面地对马克思的思想理论展开新的讨伐。

为适应这个需要，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西方媒体出版和传播一系列否定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著作，其中最重要的，包括《悲情的收获：苏联集体化及残暴的饥荒》^⑥、《重评斯大林的恐怖统治》^⑦、《苏联的人权状况及其与美国的比较》^⑧以及《共产主义黑皮书》^⑨等。在法国出版的《共产主义黑皮书》尤其尖锐地把共产主义与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相提并论，试图全盘抹杀近两百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成果。

显然，对于任何一位历史伟人及其思想，都比对于其他社会现象的评价更加复杂得多。因此，对像马克思这样的历史人物的思想的评价，

往往需要经历相当长的时间,还要在极其广阔而复杂的空间维度中,进行反复的实践的检验,在多学科和多领域的测试和分析,才能得出较为认真可靠的结论。

法国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特别强调对“长时段”(longue durée)进行“宏观/微观”双重历史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们认为,历史发展或快或慢,但推动历史的深层力量却只有在“长时段”中才能发生作用以及被把握。年鉴学派为此全面调查、分析、研究经济和社会系统的缓慢变化过程,同时又把习俗、心态当成历史的度量衡,将技术、能源使用形式(如人力、畜力转换成水力、风力、机械力的转换过程)以及对人们社会基本现象和问题的态度(如对劳动的鄙视转换成劳动进步的概念、对死亡的消极恐惧转换成逐步控制死亡的观念、把消费与勤俭相对立转换成把消费当成生活时尚的观念等)看作是历史分期的标准,如此等等。

真正体现历史性质的现象,只有在“宏观/微观”以及“长程/短程”相结合的复杂观察研究视野内,才能发现它们的真正性质,也只有这样,才能正确把握历史本身。

马克思思想及其效应,由于与近现代社会的命运紧密相联,对它的观察分析也只能在长时段和短时段综合研究中进行。

但问题的核心正是在于马克思思想本身的性质及其内在精神能量。马克思思想在马克思逝世一百多年之后的当代社会,仍然具有强大的威力,对于当代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重建发生深远的理论影响^⑩。美国拉法耶特大学哲学系主任乔治·帕尼查(George E. Panichas)承认:“在马克思逝世一百年的今天,卡尔·马克思的最为广阔的影响,是任何一位学院式训练出来的哲学家所不能及的。”^⑪

应迎上述挑战,德里达和让-雅克·贝克尔(Jean-Jacques Becker, 1928—)一起^⑫,连续发表批判性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马克思的幽

灵》^⑬，一方面站在正义的立场，试图客观地重新评估马克思的思想价值及其历史效应，同时也强调新时期继续进行对抗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必要性，德里达甚至以借喻形式主张重建“新国际”，以便发动全球正义力量阻止右翼分子的新神圣同盟对历史的歪曲。

德里达认为，马克思本人虽然逝世了，但他的思想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德里达使用“幽灵”概念，不但是为了直接应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话语来回击反共分子，而且，更重要的是为了宣示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这个新时代的特点，就是传媒技术改变了全球时空结构，使虚拟的事物以无形的方式无所不在，制造传播、印记和各种共时化的存在条件，使真实的和虚幻的事物混淆起来，生死模糊，真假不分，社会的发展趋势难以捕捉和不可预测，出现“非生非死、非在场非缺席、非真非假”的现象。

德里达说：“马克思有一段用‘幽灵’论及哈姆雷特的文字。无论如何，‘幽灵性’和‘鬼’的特点是与‘可见性’、巨大‘可见性’的关系，而可见性总是在地平线上出现，就是在未来道路上出现。至于‘鬼魂’(revenant)，我们看不见他必然来，它不必然是可见的。他的到来是不可预见、不可见的。……，我可以大胆地说，事件，要到来的事情，不可预见地像‘鬼魂’，而不是像‘幽灵’和‘鬼’两者那样来临。”^⑭

与此同时，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当代马克思》(Actuel Marx)编辑委员会在1990年五月中旬，在巴黎大学召开了“共产主义的终结？还是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的国际研讨会(La Fin du Communisme? L'actualité du Marxisme? Colloque International, Sorbonne, Paris. 17 - 19 Mai 1990)。研讨会邀请了来自德国、意大利、美国、英国以及法国的著名学者，经过激烈、而又相互包容的民主争论，一致肯定马克思学说迄今仍有生命力，尤其重视马克思思想对于当代社会理论重

建的意义。

该研讨会上由纽约“布罗代尔研究中心”(Fernand Braudel Center)主任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 1930—)教授主持的讨论会深入探索“在长远的历史时期内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问题(Capitalisme et socialisme dans la longue durée historique)。从长远的历史考察,马克思思想是人类文化发展的重要产品,它总要不可避免地伴随着一次又一次重大社会历史危机而被不断重复地怀疑、评价和分析。苏东欧集团的崩溃事件后较长时间的平静思索,又使理论界对于马克思思想的意义有更深的认识。

1995年9月在巴黎大学召开的规模更为盛大的“纪念和评价马克思”国际学术研讨会,邀集了全世界最负盛名的马克思学说研究者,包括英国的“分析的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科恩(Gerry A. Cohen, 1941—2009)、雷默(John E. Roemer, 1945—)等人,美国的世界体系理论思想家华勒斯坦;当然也包括法国最著名的马克思学说专家、巴黎第十大学哲学系系主任艾蒂安·巴里巴尔(Etienne Balibar, 1942—)、巴黎第一大学哲学系系主任托舍尔(Andre Tosel, 1941—)、“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理论家拉毕卡以及成功地将马克思学说运用于当代人类学研究中的法国马克思主义社会人类学家哥德里耶(Maurice Godelier, 1934—)等人。这次会议正是针对20世纪80年代末发生的苏东欧国家崩溃事件,针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转折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理论问题的复杂性,展开深入的讨论,并给予尽可能客观的和具体的评价^⑤。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的重重危机给予马克思思想提出的各种挑战,推动了马克思思想研究的新浪潮,使马克思思想在21世纪进一步获得了自我激活的新机会,也因此又一次实现了思想更新过程。在